

文人辦文藝刊物

瞄準校園 寄望成功

「難道在香港辦文藝刊物都必定失敗告終？」關夢南說道。

身為本地文壇重要人物的他這樣說，在旁聽者難免令人感到唏噓。令人欣慰的是，他沒有以這句話作總結，老馬依然有火，夥拍志同道合的李洛霞、袁兆昌合編《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下簡稱《月刊》），為學生開闢投稿發表的園地，勇氣和誠意固然可嘉，難得的是創刊號有逾千份預訂。多年辦刊物經驗的關夢南坦言當中經過多番考慮和妥協。「辦文藝刊物也要有商業考慮，不能像以往那樣閉門自當編輯老爺，要走出辦公室去看看才行。」創刊號的成功總算印證他辦《月刊》的路是走對了。

文、攝：盧寶迪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香港，文學仍屬小眾，《字花》銷量有1,400本已是很好的了，最低銷量的文學刊物可以低至數十本，如何在保持文學質素與擴充銷量之間取得平衡，是個關鍵，畢竟獲得五、六十萬資助而銷量僅得數十本，那是對不起納稅人，是很浪費的。」關夢南如是說。

辦刊物，總不能把一切想得太理想，也得考慮市場因素，身為《秋聲》和《小說風》的主編，面對兩本文藝刊物銷情低迷——「3期賣出77本」，關夢南以「慘痛經歷」來形容當中的過程。這次他與李洛霞、袁兆昌三人合編，他指李洛霞的20多年傳媒及編輯經驗，加上袁兆昌的活力和時事觸覺，各人都能發揮所長。袁兆昌曾是關夢南寫作班裡的學生，現時在工餘時間主理獨立出版社文化工房的運作，如投稿整理、對封面設計的要求，正好在月刊裡發揮出來。他客氣地說負責月刊的工作是個學習過程，像是跟兩位前輩學習。

願意撥出私人時間來處理月刊編務，使命感一直是袁兆昌背後的推動力。「希望文學為大眾接受，但在實踐時，難免會有差距。我期望能夠保持戰鬥力，不想它因太多的討論而消耗。」近年香港鼓勵發揮創意，視覺藝術、設計之風盛行，他希望中學生不要忽略文字的作用，多多利用這個機會來投稿，畢竟現在投稿的園地有限，而本地文學正需要這類空間來培育。「創意若不從文字出發，那會變得空白。以文字表達的本土精神，是要有活力的，不是『動感香港』那種，而是尊重歷史和文化，向有價值的東西致敬。」

瞄準受眾 先求止蝕

為免重蹈覆轍，關夢南事前分析讀者群。「第一類是社會青年，他們少看書；第二類是大專學生，但他們很多都不買書也不看書，較多的是到圖書館借書；第三類是中學生，他們買書量最多，我曾到沙田一間中學搞書展，3小時內賣出價值1至2萬元的書籍。」

所以關夢南便把目標對象定為中學生，他又指刊出學生作品，無論是校方和家長，都直接或間接鼓勵同學繼續寫作。「一來銷量有保證，二來名家作品也可流傳。月刊有部分篇幅會刊登著名作家的作品，學生便可閱讀他們的作品。創刊號未出，訂戶超過1,000人，反映中學生確實需要這類刊物。」銷情反應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隨意也能說出數間學校訂閱數目。「早到屯門天主教中學擺攤，即場賣出150本月刊，連新書《關夢南新詩10堂課——中學生寫作提速班》也賣出300本。」他指現時情況跟原先想法相符，在全港440多間中學裡，他指若有50間中學訂閱，保守估計能賣出約3,000本，起碼不用虧蝕，有望做到脫離資助，自力更生。

以中學生為目標對象的另一原因，關夢南認為他們的可塑性強。「中學生對寫作還有夢想。你跟大學生或在職青年說，他們不會理睬你，他們知道不可能靠寫作維生，夢已經碎了。」

堅持質素 滿足需求

經過昔日的慘痛經歷，分析讀者群和《月刊》的方向，他和李、袁二人都有共識，要有紀律——「嚴受死線，以免推遲了出刊日期或脫期。」他們也需要作出商業考慮，《月刊》刊登學生投稿以至「焦點校訪」部分裡所選擇的學校，也會考慮該校的訂閱情況。「質素固然重要，但這當中需要妥協，不過最終受益的是本地文學。現在的情況是和尚到民間化緣，不像以前那樣，和尚把廟建在半山，靠信眾自發上山求學。」所以《月刊》除了有刊登中學生投稿和著名作家的作品之外，也有針對學生需求而做的專題部分，如「寫作題目詳析」和「摘A個案實錄」等。

關夢南對《月刊》的前景感到樂觀，期望今年能做到一期賣出5,000本，內容方面也希望可以刊登更多文學味濃、篇幅較長的作品。

《月刊》創刊號的成功，或許為文藝刊物的生存提供一個明確的指引。

獨立出版社在台北書展嘗新體驗

《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編委之一袁兆昌，本身亦為獨立出版社「文化工房」的掌舵人，他坦言《月刊》辦得成功，有望藉此作為選擇新作者的平台，畢竟面對市場競爭劇烈的獨立出版社，它們亦需在社會裡不斷找尋新的聲音。早前袁兆昌便聯同不少作家和文化人，到過文藝氣息較濃的台北書展，跟不少獨立出版社交流，獲益良多。



袁兆昌參與推動港、台兩地文藝交流。

租用攤位，香港書展則需由學者、作家組成的顧問團挑選。「台北書展裡辦活動都有記者紀錄活動，宣傳上懂得用主題方式介紹，主動跟傳媒接觸，這跟香港書展很不同，作家的宣傳都得靠自己一手一腳包辦，主辦單位在文學方面較少主動做宣傳。」

近幾年都到過台北書展的袁兆昌表示，今年特地多了跟台灣的出版社如洪範、行人出版社合作，在會場展廳租用攤位舉辦多個與台灣作者交流的文化活動。既合作打通6個租用攤位，以機場場景的概念打造攤位，選舉辦本地與當地作家的對談活動，如周耀輝、洛楓的對談，以及方文山、鴻鴻、也斯談詩詞等，營造更多交流的機會。

交流推動文化

袁兆昌到過民辦的台北書展與官辦的本地書展，兩者相比，袁兆昌說前者較為開放，接受公開申請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台北書展所定的方針和獎項，推動當地出版業以至文化藝術的發展。「前台北書展董事長林載爵特別關注獨立出版社，大會設一個個2米乘2米的攤位，以特別便宜的租金予以獨立出版社。台北書展設立獎項，如南方家園出版社便連續兩年奪得金蝶獎——台灣出版設計大獎。獎項成了行業指標，令當地出版的質素，超越一般的華文書籍，也是對這行業、創意的一種鼓勵。」

憑藉以往參展的經驗，袁兆昌在預算行程和支出上籌備半年時間，直言付出都是值得的，所得回報可說是讓當地人認識。「花費雖大，但發揮的作用可累積下來。經過深入交流，資源回報總會到來。」



創刊號的訂戶逾千個。



關夢南嘗試在文學與商業之間取平衡。

文壇新獎：李聖華現代詩新人獎

文壇出現新獎項，實是喜事一樁，說的是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及培英中學校董會主辦、《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協辦成立「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150萬專款，並舉辦「李聖華現代詩新人獎」，以鼓勵及推廣香港現代詩創作，傳承及發揚中華漢詩傳統。而當中公開組冠軍可獲獎金5萬元、中學組冠軍獎金1萬元，堪稱全港文壇獎金最高的獎項。

「李聖華現代詩新人獎」分公開組、中學組及小學組，中、小學組的參賽者須為在校學生，而公開組參賽者須為持有香港身份證而年齡不超過35歲人士。比賽現已接受報名，截稿日期為7月25日，得獎名單將於9月25日公佈。

有關詳情及下載報名表格可登入官方網址：lsw_poet.35.com

英國文化與你系列

先有Change，還是先有Leader？

隨着西九文化區的發展藍圖逐步落實，各項大型基建如表演藝術場地、博物館等率先竣工，香港的文化藝術景象將會重大改變，同時對藝術人才，特別是管理、行政方面的領導者可說相當迫切。英國文化協會跟香港大學「文化領袖航程」合辦「領導變革——文化領袖」論壇，多位英國著名文化領袖，包括「Clare領袖培訓計劃」主席John Tusa爵士、紐卡素Northern Stage劇院總裁Erica Whyman、文化網站出版人John Newbigin、資深編舞家兼舞蹈家Fearghus O'Conchuir等，他們分享經驗及跟參加者討論，從管理、創作、身份認同、責任到成功，令大家更能明白文化領袖在劇變的環境創造文化新局面。

勇於面對問題

John Tusa爵士在1986-92及1995-2007年間分別擔任英國廣播公司全球服務總經理及倫敦巴比肯藝術中心的常務董事，親身領航過多番文化變革，「不同經驗告訴我不同的解決方法，我曾面對很多次失敗，但幸運的是我能跨過失敗，身為領袖就是要面對失敗及風險，要成功就要建立自己的團隊。」

他身為英國廣播公司全球服務總經理時，一眼看到問題在於缺乏進步及應對世界變化的心，「幸好機構內已建立一種身份認同的文化，向心力很強，只差明確的發展方向。」他強調身份認同的重要，如果機構上下沒有共識，內部的不滿只會造成「逆流」(backwater)。「我所做的，是改革節

目編排、預算及管理方式，結果就是在節目時數、觀眾人數、影響力、聲譽等方面都有提升。」而他在巴比肯藝術中心的情況很不同，內部混亂，未能建立營運理念，「我要轉換主要的管理人員及建立自己的班底，建立應有的身份認同感，還有改革節目等。」總結兩次經驗，John Tusa爵士得出的結論是：面對問題，不迴避挑戰。

尋找共識路上

之後的三位講者以親身的經驗出發，大談如何籌辦文化及藝術活動。John Newbigin就以Culture24發展成「全國的虛擬博物館」之路，來說明作為一個「領袖」，應如何對應社會的種種變遷，「這麼多年來，搞文化藝術的預算及聘請職員人數也沒有變，變的是成功及重要性而已。」從決定主要用家，到加入旅遊元素，再到推介晚間文化節目，他說由始至終，都是要尋找共有的理念及宗旨，「發展時要不斷地調校本身的目標和身份，制訂連貫的長遠策略，也要迅速應對新的機遇和威脅。」在金錢、時間及人當中，他認為人是最重要的。

紐卡素Northern Stage劇院總裁Erica Whyman分享劇院在這幾年「艱苦經營」仍能保持競爭能力，重點在於建立「共享文化」，內部上下都有共同的理念——明白大家的責任，從中建立互信。「曾有段時間遇上財務問題，那時我們開了一次會，將情況告訴所有同事知道，其中一位入職不久的同事立即說：What can we do?她不是問上級會做甚麼，而是她和其他



John Tusa爵士。

同事能做甚麼。」

領袖於轉變時

Fearghus O'Conchuir認為在文化變革中，大型跨國公司可以比作大象，中小企業及獨立藝術家可以比作跳蚤，後者帶著資訊從一個地方跳到另一個地方，更具靈活性，亦可以「惹人厭」地去推動變革，讓前進中的大象改變方向。他放映一段自己的作品《Pick'n Mix: the Dance Selection》，令大家更明白藝術家是如何讓自己去跟社會連上關係，舞者在教堂中跳舞，正如他用自己的身體作為手段來「介入」社會，應對及領導文化機構以至整體社會的變革。

對於香港這個從來都以經濟為主導的地方，推動文化只是被視為無利可圖、清高、遠離群眾等，但時移世易，搞文化已是全球的大道理，但這條大道理落在香港，就顯得有些步伐未一致——那麼，究竟是香港要變，才有文化領袖出現，或是有文化領袖出現，香港的環境才會改變？

文：阿卡比